書評
考古人類學刊・第 78 期・頁 147-162・2013
DOI:10.6152/jaa.2013.06.0006

臺灣南島社會文化研究的里程碑：《「文明」之路》的評論*

陳 文 德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在社會變動時期必要的是，洞察到目前為止的原則是否還可以沿用，如果已經不再適用了，就心情愉快地探求符合新時代的原則。....改變想法的第一步是給現在發生的變化起一個確切的名字，將其對象化。
>
> (落合惠美子 2010[2005]；158)

> *One of the reason why I think there is no hope today for future possibility is precisely because people feel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to the capitalist system, and even more to the neo-liberal form of capitalism which is dominant today.*
>
> (Chantal Mouffe, quoted from Zournazi 2002：135)

> *..., in its quality of being attuned to incongruity in the conditions of everyday sociability, ethnography emerges as a "method of hope."....The limits of neoliberalism are accessible primary through ethnographic inquiry.*
>
> (Greenhouse 2010：135)

前　言

《「文明」之路》是黃應貴教授綜合他從 1978 年開始在南投縣信義鄉東埔布農聚落研究將近三十餘年的成果，探討的時間縱深則橫跨日治時期至 21 世紀前十年這段約一百二十年的光景。雖然「東埔社」是一個人口不多的小聚落， 作者在以「『文明』之路」為名的三部曲中（黃應貴 2012a, 2012b, 2012c），[1] 試圖賦予東埔布農人與臺灣南島民族研究上的重要意義。他在第一卷首頁就做了這樣的闡述：「本書三卷將以筆者自己最為熟悉的東埔社布農人為中心，以個案研究方式來呈現台灣南島民族近百年來經歷之歷史過程的整體樣貌。因此，三卷雖分別述說三個歷史時期當地布農社會文化的不同發展，

* 筆者感謝鄭依憶在撰寫與修改本文時提供諸多寶貴的意見，唯一切文責由筆者自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但每個時期的描述與討論，並不具侷限於該時期的現象與關懷，**而是從百年來發展過程之特殊歷史視野及全人類社會文化整體發展趨勢的比較觀點來看那個時期。**」（黃應貴 2012a：1）。[2] 作者指出，全書關鍵性的「文明化」過程是「東埔社及其相關的人如何從特殊的歷史與社會文化脈絡中解放出來而成為有選擇及創造未來的『人』之過程」（黃應貴 2012c：255）。因此，「文明（化）」一詞即隱含著一個心理、社會與文化的過程，也涉及作者對於歷史、文化甚至心性的看法。

這樣的視野不但清楚地標示在每一卷的標題上，也詳細地呈現在每卷的分析與討論。其中，布農人的人觀及其背後的 *hanitu* 觀念的發展，是貫穿三卷的一個重要主軸。為能清楚呈現三卷各自的研究重點以及之間的相關性，作者在每一卷的第一章都具體地勾勒該卷涉及的時空脈絡與主要議題。這樣的安排的確有助於讀者的閱讀以及瞭解作者的企圖。為便於討論這部著作對於臺灣南島民族以及臺灣人類學研究發展的意義，筆者擬先扼要敘述三卷的主要議題與論點。

《「文明」之路》三卷的主要議題與論點

《「文明」之路》第一卷是《「文明化」下布農文化傳統之形塑（1895-1945）》。此卷主要是以基本文化分類，包括人觀及及其背後的 *hanitu* 觀念、空間、時間、物等，透過日治時期的文獻，來呈現日本殖民統治下布農地方的形塑與發展。[3] 作者根據 1978 年以來累積的民族誌研究成果，重新閱讀日治時期的文獻資料以及這個時期的相關研究，指出人觀在日治下的東埔布農社會各個生活層面的深遠、全面且整體性的影響。要言之，作者認為，就本體論而言，布農人的日常生活活動充滿著夢占與禁忌、夢境與真實不分一樣，至於「經濟」、「政治」、「親屬」與「宗教」等用語，是在戰後現代化過程才逐漸被凸顯出來的獨立分析範疇。

也因為布農人的社會文化特性，在日本殖民過程中處處可見與「文明化」的殖民政策（包括其引入的資本主義經濟觀念）格格不入。例如，對於日本殖民者來說，聚落範圍的認定是重要的，但是對於東埔布農人來說，並沒有客觀的空間範圍與中心/邊陲之區辨，而是先透過射耳祭來確定聚落成員，再依成員所使用或擁有的土地來界定聚落的範圍（黃應貴 2012a：45）。[4] 又如「打獵」，日本殖民政府係以生產價值或生產方式來評估其效益，但這實已貶抑打獵這項布農人高度重視活動的社會價值（頁 71）：打獵不但是取得獸肉的主要手段以及以獸肉作為吸引聚落成員協助農業生產工作，也是獲得社會

臺灣博學術期刊資料庫

地位的重要歷練（頁 85），而且打獵的訓練過程涉及文化特有的某種認識世界的特殊能力之培養（頁 86），並因夢占而觸及心靈的深層（頁 87）。

也因為布農社會文化的特性，致使有些日本殖民政策的推行非但無效，反而提供東埔布農人發展新的社會關係的條件。例如，集團移住提供了整個陳有蘭溪流域各聚落建立聯姻關係，而形成一種新的區域體系，這不但緩和日本殖民透過集團移住方式來孤立地方社會或聚落以達治理的企圖，而且發展出足以對抗殖民政府所主宰的地方體系之另類系統，甚至加強原先的禁婚法則（頁 161-162）。

換句話說，凡與布農平等社會特色相互衝突的殖民政策，特別是與其人觀及背後的 *hanitu* 信仰有關者，不僅難以有效執行，反而凸顯出文化觀念的持續，進而創造出新的意義以抗拒國家力量而為其文化認同的可能（頁 164）。不過，集團移住與水稻耕作等政策，終究導致原本家重於聚落的特色逐漸轉變為聚落重於家的集體化趨勢。這種趨勢在戰後更為明顯，直到 1980 年代茶葉的栽種。

第一卷除了聚焦在日治時期東埔布農社會生活的討論，實已呈現出作者寬廣的理論視野與關懷。例如，作者在第一章「導論」就明確地指出，「從台灣島上居民活動所涉及的人、時間、空間、物等的歷史條件來看，臺灣的歷史發展（筆者按：也包括東埔布農在內的臺灣南島民族），無法自外於中國史、東亞史、東南亞史、南島文化史、西歐資本主義擴張史、乃至於世界史」（頁 2）。換句話說，臺灣本身即為含納各種文明（東亞文明與南島文化）、考古文化（大陸文化與海洋文化）、語言體系（漢藏語系與南島語係）與經濟力量的多重交會點，並且從十六世紀以來，由於世界性資本主義經濟、傳統與現代國家統治、基督宗教以及地方社會互動及內在的發展等四種力量的運作，而呈現地方文化變異性以及文化與族群不斷再創造的複雜面貌（頁 2-4）。類似地，作者在第五章從十五世紀商業資本主義興起而發展的環境主義思維，來思考日本有關臺灣國有林地的設置與林業政策時，也已透露出我們如何重新認識殖民過程，並發展將所有人類視為一個種屬的思維（參閱 Moore 2003）。這樣的視野呼應了作者認為必須從與全人類社會文化整體發展趨勢的比較觀點來觀看東埔布農社會與臺灣南島民族的論點，並且具體展現在《「文明」之路》的研究。

《「文明」之路》第二卷是《「現代化」下文化傳統的再創造（1945-1999）》，時間上，從戰後（1945）到臺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的 1999 年為止，是所謂的「現代化」時期，也是作者（1947～）生命經驗與從事研究的重要階段。就內容而言，第二卷無疑地是《「文明」之路》三部曲中最為清楚與系統地綜合與呈現作者到二十一世紀之前的研究成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同時也展現臺灣人類學如何奠立在長期田野工作的基礎，並且與世界人類學關注的問題的發展一直密集對話的特色。就其論證之縝密、探討問題之深入與思維的廣度而言，稱之為臺灣南島民族研究的一本經典，實不為過。

作者在這個階段的研究，主要從經濟、親屬、宗教與政治等層面探討東埔布農社會文化，例如，第三章「國家化的政治」、第四章「資本主義化的經濟」、第五章「基督化的宗教」以及「第六章「親屬、婚姻與家」。這四個領域是社會/文化人類學一直到 1980 年代所說的四個主要分支。不過，由於作者從 1980 年代末期陸續推動的「文化分類概念」，這些看似獨立研究的領域不但得以綜合銜接，也因為布農社會文化特色，而更加凸顯出其整體性分析的特點。[5]

以「政治」為例，雖然日治時期已有這樣的觀念，但真正產生作用而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是先透過東埔布農人認定傳統政治社會領袖時所依據的人觀及 *hanitu* 信仰、空間類別以及各種交換所產生不同性質權力方式來理解（黃應貴 2012b：51）。例如，在東埔布農人的觀念中，領導人與被領導人之間關係的建立，是經由三種不同的交換方式而來。這三種交換方式也各自隱含著不同性質的權力：（1）*isipasaif*（共享性的交換），是個人與群體之間的交換，是在聚落範圍內；（2）*isipawuvaif*（個人間競爭性交換），主要在聚落範圍，而且因為現代選舉方式而取得支配性，並且與共享性權力分離（頁 38），使得表面上是地方「政治」領袖的行政首長或民意代表，不一定能成為維持該地方政治社會秩序的領導人；（3）*ishono*——只施給而無回報。然而，隨著聚落逐漸納入戰後國家藉由地方行政制度以及其他管道，包括空間的建構，而分化東埔聚落內部社會秩序的運作。例如，選舉取代 *mabeedasan*（「大家都同意」）的方式，不僅加深了（1）與（2）的分離，更加強領導人與被領導者的功利主義式權力關係，因而建立了一個新的「政治秩序」與「政治」活動（頁 45）。

換句話說，國家意象及意識型態的建立過程，除了國家透過的各種管道來灌輸，也是因為教會、漢移民、市場經濟的發展，乃至於當地布農人的文化分類概念，所結合發揮的作用。例如，教會帶入新的時間、空間、人觀、物、文字與知識等概念，協助建立出一個超越原有地方化的新文化秩序（頁 41）。也是在這種秩序建立的同時，凸顯出東埔布農人如何依其文化觀念將其區辨出來，使其成為新的「政治」類別，而有別於他們觀念中的聚落的「政治社會秩序」（頁 51）。[6]

這樣交錯複雜的關係，也可以茶的栽種進一步說明。茶是定耕、多年生且無法依賴夢占來預測未來所得的一種經濟作物，這些性質不但與傳統的觀念有很大的差別，更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為資本與知識技術在種茶過程的重要性，茶逐漸成了無主體的「純」經濟性作物，這樣的發展也使得當地布農人的現代「經濟」類別更趨成熟（頁 109）。同時，在種茶過程中，當地人與「外來」漢人資本家共構成以「企業」為中心所產生的新社會分類，既不是種植小米時以家為主而以聚落為輔的景象，也不是耕種水稻時以聚落為主而以家為基本單位所構成「純粹」布農人的社會（另見黃應貴 1993）。要言之，「經濟」與「宗教」彼此糾結而難以清楚區辨的本體論的觀點，在種茶時期已經明顯區隔了。

另一方面，蕃茄、茶這些經濟作物先後的引入也逐漸造成東埔內部貧富不均的現象，並且在 1970 年代末期、1980 年代初期導致「異夢派」宗教運動的興起。異夢派成員為了證明他們的儀式行為，特別是夢占、禁食及集體禱告治病，均是記載於聖經的正道，於是開始大量閱讀及使用聖經，使得聖經的詮釋不再為神職人員及長執壟斷。如此一來，東埔布農人將儀式、組織及教義等要素完整結合起來，而接近現代西方對於「宗教」的理解。

諸如「政治」、「經濟」與「宗教」這些類別的發展，實與第一卷透過人觀、空間、時間與物等文化觀念所呈現的東埔布農人的本體論特徵有著明顯的差異（頁 178）。不過，也是在茶葉種植的過程中，我們得以看到布農人觀的作用及其轉化。例如，種茶有成果的布農人，依然在追尋人觀中強調個人私利與集體利益的平衡，只是這種平衡已經不像以往並不區辨經濟與宗教活動，而是將私利與集體利益分別表現在經濟與宗教這兩種不同的活動領域上（頁 111）。

整體而言，第二卷的研究成果，尤其人觀等文化分類概念的探討，既結合民族誌與日治時期文獻與相關研究，而從一個貫時性的視野探討東埔布農社會文化性質的轉化，同時也提供作者嘗試分析討論第三卷「新自由主義秩序下的地方社會」的基礎。另一方面，也因為第二卷厚實的民族誌研究與分析以及綜合的特點，對於第一卷提到的一些鉅視性的問題──例如，具有世界性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意涵的殖民主義以及曇花一現的環境主義──有著更為具體的勾勒，並呼應大歷史的趨勢。再者，就東埔布農人來說，第二卷所討論的「現代化」時期乃是將所有人類文化在幾百年中所共同構成某個歷史階段的趨勢，濃縮在這五十多年的時光中，既呈現時代的精神，對於人性的深層層面也有嘗試性的思考與探索，這也是第三卷《新自由主義秩序下的地方社會（1999 迄今）》主要關注的議題。

作者在第三卷的〈序〉一開始提到他是在撰寫《臺東縣史・布農族篇》（黃應貴 2001a）時才意識到這卷的主題：新自由主義秩序下的地方社會。相較於第一、二卷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時間縱深，第三卷涵蓋的時間範圍雖然只有十年左右，卻是三卷之中篇幅最長、觸及面向最為複雜，也是最不易讀的一卷。筆者認為，這固然是第三卷主要討論近十幾年正在發展的現象，相關的研究也不多，更是因為作者試圖發展新的觀念——例如「意像」、「心靈」、「情緒」——來理解，而跳脫過去諸如「族群」、「地方社會」與「國家」等已有理論概念所造成的束縛（黃應貴 2012c：vi, 267）。也因為新的觀念的發展以及如何理解正在發展中的新的現象，整卷的書寫方式迥異於前兩卷，尤其是報導人的敘說以及有關「想像」與「意象」的討論。而貫穿全卷的一個重要主軸是跟「人」有關並且涉及深層的心理機制，例如：人對於「存有」、「自我」、感官經驗、以及認識世界的方式等。作者指出，這些發展是跟聚落內部異質化、多樣性甚至階級化的浮現密切關連，而結合這些討論的重要軸線就是對於這世界以及自己的各種不同想像（頁 50），並且進一步從宗教、家以及跟聚落有關的「地方意識」分章論述。

以宗教而言，作者指出宗教是否滿足個人心理的需求，是當代一個重要的發展趨勢，這具體表現在他們參與其他教派的活動、教會本身的創新，或者聚在一起小酌等個人性的新儀式（頁 80）。這樣的發展既符合家乃至個體的主體性的強調，也呈現東埔社內部的歧異性（頁 100-101）。個人化、心理化乃至於多樣化的趨勢，更顯見於家的層面（頁 147)。

日治之前，東埔布農人的家的獨立自主性是優先於聚落的存在（頁 148）。但是由於日本殖民統治，訂定家戶登記資料，同時建立以駐在所為中心控制地方的警察行政、交易、教育以及醫療等功能的地方行政系統，將原是分散的家集中成最小地方行政單位的村落，從而使聚落的地位超越家的獨立自主性。此一集體化新趨勢，因殖民後期強迫布農人進行集團移住以及水稻耕作而更為凸顯（頁 149）。雖然這種集體化提供戰後布農人適應農業商業化的發展，適應成功的結果卻也導致當地布農人自行決定其生活節奏及生活方式，而有著個人主義化的趨勢（頁 150)。換句話說，除了「現代家庭化」的趨勢，布農人同時也有著個人化、心理化（多樣化）的趨勢：一個「家」是否能繼續維持下去，乃至於茁壯、成長，就得依賴共同的生活方式或生活節奏是否能夠培養出「心理慣性」（psychological idioms），以孕育出該家的精神氣質（ethos）而為這家特有的氛圍，進而維持當事人之間的穩定感情、並為篩選符合該精神氣質的人成為該家新成員的關卡。作者並以八個「樣態」的家庭為例，進一步說明（頁 153-205）。這種心理慣性及精神氣質，不但彰顯布農人的家是以「夫妻」為主軸的特徵，也呈現出布農人人觀一些隱而未顯的特性在今日的發展。這樣的特徵最明顯呈現在共享意象為基礎的地方意識的浮現。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從政治、經濟、親屬與宗教等不同層面來看，相關社會活動與實踐的進行，多已超越第二卷現代化時期發展出來的以聚落為單位的範圍。也就是說，當大部分的社會活動已超越聚落的範圍時，東埔社本身已不再是許多社會生活的主要單位（頁 82）。不過，作者從「心理化」的討論另闢蹊徑，指出聚落作為生活單位已不再是依據類似以往的活動規範與個人間的權利義務關係，而是有著更值得思考的深層心理機制與心智（頁 84）。作者認為，這裡已經涉及新自由主義所強調的個體與自我的獨立自主性，而且影響了布農人對於未來希望的想像與意象的建構（頁 235）。

《「文明」之路》的重要研究意涵

《「文明」之路》是作者綜合三十餘年來的研究以及文獻資料而對於東埔布農社會百餘年來面貌的勾勒與解讀的鉅著。單就民族誌研究而言，如此縱深時間的研究，在臺灣南島研究史上可以說無出其右，[7] 甚至在人類學界也是少見（詳下）。筆者認為，除了布農族研究上的意義，《「文明」之路》不論是對於社會、文化、歷史等基本概念的探討，或者對於臺灣南島民族與臺灣社會的「族群」、「區域構成」與「文化創造」這些既有的重要課題或者「心理化」、「情緒」等仍待發展的領域，都提供相當值得參考的論點以及作為比較思考的範例。以下僅就幾個重要的特點略做描述：

（1）本體論與知識論的連結[8]

《「文明」之路》凸顯出社會文化的本體論的重要性。作者在第一卷提到日本殖民者與布農族之間的重要差異即在於彼此本體論的不同假定上：「對日本殖民政府而言，正如所有走向現代性的殖民國家一樣，所有的文明化政策是建立在 A. Giddens（1984）所說的真實與虛幻的分辨上。但當地布農人的宇宙觀中，正如日常生活活動充滿著夢占與禁忌、夢禁與真實不分一樣，所有的『經濟』、『政治』、『親屬』、『宗教』等相互緊密關連而難以分離」（黃應貴 2012a：128）。

類似地，第三卷討論新自由主義經濟下的地方社會時，則提到資訊、象徵溝通媒介急速的發展，加上個人化的趨勢，乃至模糊了第二卷現代化時期原本已分離的各種生活領域的區別。這種本體論的差異及其轉化——具體展現在人觀及 *hanitu* 觀念——對於整體性地論證社會文化的持續與轉化，包括個人心理化趨勢、情緒的作用，甚至意象的討論，都有其重要的意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結合包括全人類共同趨勢的「大歷史」與建立在長期民族誌的布農族社會文化的「小歷史」的史觀

凸顯東埔布農社會文化的本體論的特性，及其歷經現代化時期（第二卷）到新自由主義下的生活面貌（第三卷），也展現在這三卷所呈現出來的史觀。

如果對比所謂的歷史人類學或者結合人類學與歷史的著作，例如，我們熟知的 Sidney Mintz 的 *Caribbean Transformations*（1974）、Eric Wolf 的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1981）、Sally Moore 的 *Social Facts and Fabrications: "Customary" Law on Kilimanjaro, 1880-1980*（1986）、John L.Comaroff 與 Jean Comaroff 夫婦的 *Of Revelation and Revolution*（1991, 1997），或者作者在倫敦政經學院的業師 Maurice Bloch 的 *From Blessing to Violence: History and Ideology in the Circumcision Ritual of the Merina of Madagascar*（1986），《「文明」之路》三卷涵蓋日治迄今近一百二十年的時間並不是很長。不過，如果結合作者三十餘年的民族誌研究與文獻資料來說，這樣的研究卻是很少出其右者。

這種'diachronic'而不是'dual-synchronic'民族誌研究，不但提供了更為動態的、過程的觀點，對於社會文化的性質也有了更為深層的掌握（參閱 Howell and Talle 2012）。更值得注意的是，《「文明」之路》對於文化與歷史——或者一般所說的「歷史人類學」——關係的探討所呈現出的「歷史」，既不像 Eric Wolf 將小歷史納入大歷史的發展過程，也不同於從文化來界定歷史過程的研究曲徑，而是並存著既可呈現出時代的精神與全人類社會文化發展趨勢的特色。以陳有蘭溪流域的構成為比喻，小歷史不僅構成大歷史的一部分，也呈現大歷史的整體趨勢，指向新世紀新史觀的逐漸浮現（黃應貴 2012c：258），豎立了一種歷史人類學著作的範例。這也顯示在全書以三卷分述又構成一個整體的書寫方式（同上，頁 256-257）。

（3）時代的精神與全人類社會文化整體發展的視野

誠如前述，作者在第一卷就已開宗明義指出《「文明」之路》的企圖：「從百年來發展過程之特殊歷史視野及全人類社會文化整體發展趨勢的比較觀點來看那個時期」（黃應貴 2012a：1）。筆者認為，這三卷已不只是單純的東埔或布農族民族誌，對於臺灣南島民族的比較研究、臺灣社會性質的探討，以及社會科學關注的議題之研究都有它的相關性與重要性。從臺灣南島研究來說，作者不像研究布農族先驅的馬淵東一將布農族或者臺灣南島的一些社會文化現象放置在廣泛的南島民族區域（如大洋洲、印度尼西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而是透過結合東埔長期民族誌、臺灣社會與人類學等社會科學關注的重要議題，凸顯出這個研究的重要意義。

而作者對於全人類社會文化整體發展的關注，也顯現在他長期思索「資本主義經濟以外可能性」的關懷。這或許也是為何相較於臺灣其他人類學者，作者最先指出面對「新自由主義經濟」發展趨勢及其影響的必要性與重要性（黃應貴 2012d）。

（4）「文化」概念的思考

作者在第三卷帶入了「意象」，並且賦予它在瞭解當代地方社會與文化所具有的關鍵性地位。亦即，相對於第一、二卷清楚地呈現出人觀及 *hanitu* 的觀念的支配性，作者認為，當下（地方）意象並不表現在日常生活當中，而是潛藏在個人內心的深處，因而藉由對意象的掌握我們可以觸及它存在的方法與形式。也因為意象的建構，不僅是建立在社會文化脈絡下的經驗與歷史改變的動力上，更是來自時代改變及人生生命循環過程不同階段的改變，而透過個人對於過去的反省而創造出來的。

相較於過去研究使用的概念與架構，「意象」似乎更能呈現時代性及人性普同性的特色，而且從第三卷的討論來看，意象未來有可能在當代共同的表象下突顯出每個文化獨特性的延續與深層機制。[9] 筆者認為，這對於人類學「文化」概念的發展之意義，是值得進一步思索的（參閱黃應貴 2012c：237）。

綜合以上所言，筆者認為，就民族誌分析與討論的深度與廣度、對於大寫 Culture 與小寫多數的 cultures 的共構關係的探討，以及指出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的建構有一個全人類社會與文化的整體圖像，《「文明」之路》的出版無疑地將臺灣南島民族的研究往前跨出了一大步，其討論的課題以及提出的問題，將是未來研究必須面對的。三部曲的研究呈現臺灣的特殊性與關懷，也可與當代「世界人類學」（world anthropologies）的發展有積極對話的可能（參閱葉淑綾 2012）。

閱讀《「文明」之路》後的幾個問題

作者在《「文明」之路》的討論與思考（尤其第三卷），深具開創性與前瞻性，有些是筆者仍在努力嘗試理解中，有些論點尚待作者進一步釐清與發展。

首先，作者在第一卷強調日治時期布農族的社會文化是真實／虛幻不分，而且社會文化現象的呈現及其理解是整體的，至於我們熟知的「政治」、「經濟」、「宗教」與「親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屬」等範疇，是到了戰後（第二卷）才逐漸浮現。例如，東埔布農人如何一開始是從儀式然後到教會制度，最後是教義，才發展出一個完整的「宗教」的範疇。然而，即使如此，「異夢派」等事例也指出其間的複雜性。就如第二卷「結論」一章所言：「『異夢派』宗教運動的意義，對當地布農人宗教發展的歷史過程而言，絕不只是抗拒教會主流派的宰制及漢人中間商剝削、以及引起教義爭議而導致現代宗教類別的建立，更隱含著以傳統布農人趨於不分真實與虛幻的文化假定來挑戰現代性本體論強調真實與虛幻的分辨，使當地布農人在還沒有接受新自由主義的新發展之前，卻已具備接受新發展背後趨於模糊真實與虛幻本體論的條件」（黃應貴 2012b：213-214）。

因此，當作者在第三卷進一步引用 Jean-Francois Lyotard （1984）的研究，指出資訊、媒體等科技革命，逐漸造成知識的本體論上模糊了現代化時期分離的真實與虛幻、經濟與非經濟、宗教與非宗教等各種類別時，新自由主義下的真實與虛幻模糊不分與布農社會原先本體論的特性之間，有何異同？東埔布農社會的本體論在新自由主義下又有哪些轉化？與日治時期又有何區別？

其次，作者在第三卷帶入了「意象」，並且賦予它在瞭解當代地方社會與文化所具有的關鍵性地位。如果，當下（地方）意象的討論觸及潛藏在個人內心的深處，而不是表現在日常生活當中，且「與例常狀態（routinization）有所斷裂的『非常』時刻中」（參閱黃應貴 2012c：第五章），那麼我們要如何探討「意象」的建構？而「意象」與「想像」之間有何區別？兩者的關係為何？

另一方面，作者指出意象的建構方式與布農人傳統夢占裡意象的不分真實與虛幻之本體論相當類似（黃應貴 2012c：236），而且地方想像的意象呈現出一個「潛藏秩序」是存在於個人內心深處與個人間的感情上，又似乎與布農人的人觀有著可以銜接討論的地方（黃應貴 2012c：245）。就此而言，實已涉及特定社會文化脈絡以及人性普同性的關連，但第三卷的「人觀」的性質為何？布農人的人觀與新自由主義下所強調的個體性（化）的特點，其間又有哪些異同？

第三、是跟第三卷提到的「新自由主義」有關。「新自由主義」在 1970、1980 年代已經開始發展，並且因各地區的條件而有著不同的面貌與特性。就此而言，第三卷以 1999 年為始，是指臺灣社會的確是從這個時候才開始呈現新自由主義的發展，還是這個年代的界定是呈現東埔布農人的情形？[10] 事實上，如果從一個過程的開展來說，第二卷提到的 1990 年代中、末期的一些現象（例如，茶葉的種作時期的發展），既與第三卷有所重疊，也是其分析討論的重要基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對於長期關注臺灣南島民族的人類學者而言，新自由主義經濟的運作與影響的確是要嚴肅面對的課題。不過，就如一些研究指出，新自由主義並不是一個單一且同質的過程，而是辯證的，因為過程中已涉及特定時、空的人群以及他們生活方式的作用（參閱 Comaroff and Comaroff 2000；Greenhouse 2010）。換句話說，與其將新自由主義當作既成事實，毋寧是分析這個充滿矛盾與斷裂的過程，以及與其他文化與政治經濟形構連結的方式（Kingfisher and Maskovsky 2008）。筆者認為，作者在第三卷探討「新自由主義秩序下的地方社會」的主要用意，應該是在凸顯布農社會文化另一個階段發展的脈絡或條件，而不是將「新自由主義」視為一個結構性的分析架構？從一個比較研究的視野來說，東埔布農社會呈現出來的面貌具有哪些特殊性與普同性？

最後要問的應該不算是問題，卻跟關心臺灣南島民族、臺灣社會甚至人類社會文化發展的年輕世代有著密切的關係。作者一直是以田野工作來面對當下的實際情境，就如他在第三卷所說的：「有了一、二卷對於布農文化特色的深入掌握後，我們才有可能在這全球化時代各地所有文化趨於同質化的表面現象下，看到文化差異存在與文化獨特性延續的特色」（黃應貴 2012c：267）。作者在最近一篇文稿中也這樣寫道：「就人類學甚至整個社會人文科學而言，當它無法面對當時社會文化新的現象與問題時，勢必被邊緣化、甚至喪失其存在的價值。反之，能面對新的政治經濟情境及歷史脈絡所帶來的新課題，往往促成這個學科的突破或發展」（黃應貴 n.d.: 1）。對照前後這兩段話，後者更是語重心長。筆者認為，這應該是總結作者近四十年來漫長研究的深刻感受，也是對年輕世代有著更多的期許。然而，長期田野累積的民族誌以及對於人類學或相關學科知識的掌握，都是需要時間的萃煉。年輕世代又如何可能如作者所期盼地去意識與深刻反思當代現象與發展，同時進行從事相關的研究？他們要從事怎樣的研究課題？又如何去具備這樣的條件？

附　註

1. 「東埔社」為今日信義鄉東埔村第一鄰，目前有 76 戶（1978 年為 32 戶）。由於作者多以「東埔社」行文，本文沿用之。此外，除非必要，為了行文方便，文中以「作者」指稱黃應貴教授。

2. 這種鉅視的視野也具體呈現在作者負責執行國科會「南島民族的分類與擴散：人類學、考古學、遺傳學與語言學的整合研究」（2005～2008）的子計畫「文化與族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形成與再創造——台灣南島民族的研究」的報告(另見黃應貴 1992, 2006[2004])。

3. 作者於 1980 年代後期到 2000 年代初期，先後進行人觀、空間、時間、物等基本文化分類概念的探討。每次以三年為一期，以閱讀相關著作、工作坊報告與舉辦研討會的方式進行，最後才出版論文集（參閱黃應貴編 1993, 1995, 1999, 2004）。第一卷以這些基本文化分類來討論日治時期的東埔布農社會生活，也已呈現作者如何透過民族誌對於「歷史」的理解。

4. 文中引用的頁碼係依該卷而定，若綜合三卷的討論時，則另在文中標示出版年代。

5. 這也回應了作者早期綜合臺灣南島社會研究所提到的幾個理論意涵的問題，包括社會體系、文化體系、持續與變遷以及社會制度的本質及其內在原則（參閱黃應貴 1985）。

6. 作者分別以「政治社會秩序」與「政治秩序」指稱（1）*isipasaif* 與（2）*isipawuvaif* 兩種交換方式分離的權力關係所建立的社會秩序（黃應貴 2012b：28，附註 1）。根據布農人的觀念，這兩種權力是相關的，而且呈現在其人觀與 *hanit*u 的信仰。例如，身為經濟活動領導者的教會執事與長老，一方面是以 *isipasif* 交換方式來建立個人與群體及其他成員間共享性權力關係，另一方面，又以 *isipawuvaif* 方式分辨出他們與其他一般教友間在能力上的差別（黃應貴 2012b：42）。

7. 雖然日本學者山路勝彥曾於 2011 年出版一本討論百年來泰雅族社會文化發展的著作，從內容來看，是類似論文集，討論的對象也不全是泰雅族。

8. 本體論的討論不但再次凸顯出人類學這門學科的特性以及「文化」這個概念的重要性。至於「本體論」(ontology)是否只是「文化」另一種說詞，可參考 Group for Debates i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在 2008 年的爭辯（參閱 Carrithers 2010；另見 Pedersen 2012）。另見鄭瑋寧（2012）以「本體論轉向」為題對於當代親屬研究的書評。

9. 筆者謝謝鄭依憶指出這個關連性。

10. 作者提到他是在撰寫《臺東縣史・布農族篇》時才意識到新自由主義經濟這個問題。個人認為，從某個角度來說，為何來自臺東而不是長期研究東埔的經驗，是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這是否意味著：東埔及其位處的陳有蘭溪流域固然是中、南部地理空間上的邊陲，但是就整個臺灣島來說，臺東才是一個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的邊緣區域，而從這樣的「邊緣性」更可能看到新自由主義經濟隱而未顯的面貌（參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omaroff and Comaroff 2012：ch. 1）？類似地，東埔布農的研究較少觸及不同人群之間的關係，這卻是探討東部區域形構與文化創造的重要課題（參閱黃應貴 2001b）。

引用書目

山路勝彥

2011 《台湾タイヤル族の一〇〇年：漂流する伝統、蛇行する近代、脱植民地化への道のり》。東京：風響社。

黃應貴

1985 〈台灣土著的兩種社會類型及其意義〉。《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57：1-30。

1992 〈關於臺灣原住民社會文化變遷之研究的一些芻議〉。刊於《陳奇祿院士七秩榮慶論文集》。陳捷先主編，頁 393-408。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93 〈作物、經濟與社會：東埔社布農人的例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5：133-169。

2001a 《臺東縣史・布農族篇》。臺東：臺東縣政府。

2001b 〈失落的內本鹿：一個邊疆社會中跨越族群界線的區域中心〉。《東台灣研究》6：139-159。

2006[2004] 〈想像中的台灣史〉。刊於《人類學的視野》，頁 239-244。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2012a 《「文明」之路（第一卷）：「文明化」下布農文化傳統之形塑（1895-1945）》。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12b 《「文明」之路（第二卷）：「現代化」下文化傳統的再創造（1945-1999）》。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12c 《「文明」之路（第三卷）：新自由主義秩序下的地方社會（1999 迄今）》。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12d 〈新自由主義下的原住民社會與文化〉。《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2（1）：1-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N.d.　臺灣人類學的未來？（手稿）

黃應貴 編

1993　《人觀、意義與社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995　《空間、力與社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999　《時間、歷史與記憶》。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04　《物與物質文化》。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落合美惠子

2010　《21 世紀的日本家庭，何去何從》。鄭楊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

葉淑綾

2012　〈書評：World Anthropologies〉。《考古人類學刊》76：139-152。

鄭瑋寧

2012　〈人類學知識的本體論轉向：以 21 世紀的親屬研究為例（書評）〉。《考古人類學刊》76：153-170。

Bloch, Maurice

1986　From Blessing to Violence: History and Ideology in the Circumcision Ritual of the Merina of Madagasc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rrithers, Michael et al.

2010　Ontology Is Just Another Word for Culture.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30(2): 152-200. DOI:10.1177/0308275X09364070.

Comaroff, Jean and John L. Comaroff

1997　Of Revelation and Revolution, Volume Two: The Dialectics of Modernity on a South African Fronti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Millennial Capitalism: First Thoughts on a Second Coming. Public Culture 12(2): 291-343. DOI:10.1215/08992363-12-2-291.

Comaroff, John and Jean Comaroff

1991　Of Revelation and Revolution, Volume One. Christianity, Colonialism, and Consciousness in South Afric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12 Theory from the South: or, How Euro-America Is Evolving Toward Africa. London: Paradigm Publishers.

Greenhouse, Carol J.

2010 Introduction. In Ethnographies of Neoliberalism. Carol J. Greenhouse, ed. Pp. 1-10.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Howell, Signe and Aud Talle, eds.

2012 Returns to the Field: Multitemporal Research and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Kingfisher, Catherine and Jeff Maskovsky

2008 Introduction: The Limits of Neoliberalism.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28(2): 115-126. DOI:10.1177/0308275X08090544.

Lyotard, Jean-Francois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intz, Sidney

1974 Caribbean Transformations.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Moore, Jason W.

2003 The Modern World-System As Environmental History？ Ecology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Theory and Society 32(3): 307-377.

Moore, Sally

1986 Social Facts and Fabrications: “Customary” Law on Kilimanjaro, 1880-19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edersen, Morten Axel

2012 Common Nonsense: A Review of Certain Recent Reviews of the “Ontological Turn.” Anthropology of This Century 5 (http://aotcpress.com/articles/common_nonsens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Wolf, Eric

1982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Zournazi, Mary

2002 Hope: New Philosophies for Change.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